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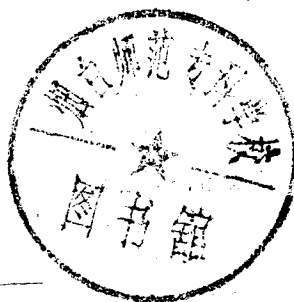
14463

14463
107

文化史料

丛刊

第三辑



11.27
5068

一九八三年一月廿日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文史资料出版社

文 化 史 料

(丛刊)

第 三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1982年5月第一版·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¹/₃₂ 印张：7¹¹/₁₆ 字数168,000

印数：12,800册 定价：0.86元

统一书号：11224·93

内 容 简 介

《文化史料》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一本珍贵史料丛刊。

第三辑刊登回忆三个文人的史料，即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口述的史料《追忆朱自清》和《反对军阀的进步报人林白水》、《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》。本辑还刊登三所学校的史料——早期清华大学、旧南开中学和长沙周南女校。此外还刊登了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开渠、早期民族音乐和儿童歌舞剧作家黎锦晖的自传，并继续刊登京剧艺术家袁世海的《我的舞台生活》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的长篇回忆录《铁马响叮当》的续文。

本辑共有十七万字，并附有一批珍贵照片。

《文化史料》丛刊编辑者

（按姓氏笔划顺序）

马彦祥	孔罗荪	刘开渠	沈从文
吴作人	吴世昌	张毕来	张西洛
张世龄	周士观	贺捷生	黄药眠

目 录

追忆朱自清.....陈竹隐 (1)

反对军阀的进步报人林白水.....张次溪 (26)

周作人投敌的前前后后.....张琦翔 (35)

五四时期的长沙周南女校.....全国妇联妇运史室 (50)

漫谈早期的清华大学.....黄炯华 (63)

旧南开中学办学的一些作法.....杨志行 (82)

我和明月社(上).....黎锦晖 (90)

雕塑艺术生活漫忆(一).....刘开渠(128)

铁马响叮当

——敦煌的春天.....常书鸿(154)

我的舞台生活(二)

——七年坐科生活.....袁世海(194)

追忆朱自清

陈竹隐

身世 事业

朱自清，字佩弦，原籍浙江绍兴，生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。原名朱自华，号秋实，名字含有“春华秋实”之意。由于三代人定居扬州，所以自称“扬州人”。他的祖父为人谨慎，在江苏东海做了十多年的承审官。父亲朱鸿钧，字小坡，



1932年朱自清留学英国时留影

母亲周氏。当时都随祖父在东海任所。佩弦出生于东海，由于两兄幼殇，他就成了长子长孙，倍受家庭宠爱，小时在耳上还佩戴着金质的钟形耳环。他们兄妹共四人。佩弦幼年在由父母启蒙自

课，后在私塾读经书、古文、诗词等。由于他聪明好学，所以很快就学通了国文，又在旅扬公学学了英文。他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毕业时，还得到了品学兼优的奖状。在校时，他非常喜欢文学，立志做文学家。一九一六年，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。次年寒假，他回扬州，遵父母之命与扬州名医武威三先生的女儿武钟谦结婚。

佩弦的祖父母去世后，家境便一天不如一天，经济上很拮据。父亲虽然做着官，但一直廉洁自守，没有积蓄，所以给祖母办丧事都要借钱。佩弦二十岁时，看到家里的经济状况，觉得按部就班地读书是有困难的，于是决定跳班投考北京大学本科，并改名朱自清，字佩弦。一九一八年，他考入了哲学系。这时，他们家中常靠借钱供孩子们读书。一直到佩弦毕业作事了，家里还欠着几千元的债，都是后来一点点还的。这样的景况使佩弦对穷苦人的生活有体会，并富有强烈的同情心。

在北京大学就学期间，正值古老的中国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代。佩弦在新思潮的鼓舞下，参加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“五四”运动，并与著名的共产党人邓中夏建立了友谊。他参加了《新潮》杂志的编辑工作，不断在学生办的周刊上发表新诗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，提倡新文化运动。新思想点燃了佩弦心中的火，诗的激情在他心中翻腾，他以满腔热情投入了新文化运动。与此同时，他发奋攻读，三年内修完四年的课程，于一九二〇年提前毕业了。

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，佩弦觉得文学可以用来抒发自己的感情，可以揭露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，可以启发教育人民，文学可以救国。由于他对文学的特殊爱好，他很快走上了文

学创作的道路。

佩弦毕业后，曾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、江苏省立第八中学、中国公学、浙江省立第六师范、浙江省立第十中学、温州十中、白马湖春晖中学、宁波四中任教五年多。佩弦的教学工作十分繁忙，有时奔波于两校兼课。他虽对教书生活有时不满意，但对教学却十分严肃认真，从不迟到早退。课堂上总是滔滔不绝地讲，甚至满头大汗。他对学生管教很严，但与学生关系却很融洽。他经常鼓励学生多读多写白话文，学生也常到他的住所去交谈。在温州时，他把新文艺的火种带到了那里，温州中学各年级的学生都争着要求他教课。他要求学生交作业不许误期或敷衍，甚至对学生作业格式都有具体规定：作文本第一页要空下来，把一学期作文题目依次写下，并注明起讫页数，以便查阅。而他自己则不仅认真及时地批改学生的作业，还细心热情地批改学生们在课外所写的大量不成熟的作品。

这期间，佩弦也时常与文学研究会成员俞平伯、叶圣陶、刘延陵等先生讨论新诗问题，民众文学问题。又创办了《诗刊》，并不断发表新诗，以提倡新文化运动。他在诗歌创作上下了很大功力，以抒发他的感受，歌颂光明，揭露黑暗。“五四”运动落潮后，佩弦思想有些彷徨，但强烈的正义感促使他排除一切困扰，努力振作起来。一九二三年三月十日，他在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长诗《毁灭》，用“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，打上深深的脚印！”的诗句，表现了自己要脚踏实地前进的决心。他又写了《赠友》一诗，歌颂了“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”的共产党员。他为“五卅”惨案作《血歌》一首，痛斥了帝国主义的暴行。佩弦用他的诗歌为正义呐喊。与此同时，佩弦的诗歌和散文在艺术

上也都达到了新的高度。长诗《毁灭》引起诗坛的注意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；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被评为“白话美术文的模范”。他以认真教学、勤奋写作，将自己献给了青年，献给了新文学事业。

一九二五年，佩弦经俞平伯先生推荐，到北京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。佩弦从此便一生就任于清华大学。

当时的北京，旧文学的市场很广，书店里出售的都是旧文学书籍。佩弦认为应该开发新文学园地，扩大新文学市场，使新文学大众化。他与俞平伯先生等十人商议决定，每人出一份钱开一个“景山书店”，专门出售新文学书籍、刊物，并请了一个人专门负责经销工作，书店的收入就维持这个人的生活。而出股的十个人都没有收入，纯粹是为推广新文学尽义务。当时，佩弦他们就是这样为新文学开拓道路的。

一九二六年，奉系军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，进逼关内，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同奉军作战，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，派军舰驶入我大沽口，炮击国民军。国民军开炮还击，日本帝国主义却联合美、英等七国公使，提出无理条件，并在天津附近集中各国军队，准备将武装干涉升级。三月十八日，北京的工人、学生为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，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大会。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，并到执政府门前去请愿。佩弦也与清华大学学生一起，亲身参加了这次集会，参加了游行请愿；亲眼目睹了在执政府门前打死四十多人，重伤二百余人的“三·一八”惨案。回来后，他以极端愤怒的心情写成了《执政府大屠杀记》一文，详细地叙述了惨案发生的事实经过，直言痛斥反动政府的暴行。他写道：“这回的屠杀，死伤之多，过于‘五卅’事件，而且是‘同

胞的枪弹’，我们何以间执别人之口！而且在首都的堂堂执政府之前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屠杀之不足，继之以抢劫、剥尸，这种种兽行，段祺瑞等固可以行之而不恤，但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，又何以自容于世界！——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！”在这篇文章中，佩弦还表达了对学生英勇不屈精神的真诚钦佩，并深刻地剖析了自己“怕”的心理。这不仅表现了他的诚朴正直，而且也说明他在斗争中变得勇敢了，在凶恶的敌人面前站了起来。

在这次惨案中，清华学生韦杰三惨遭杀害。佩弦很是痛心，写了《悼韦杰三君》一文。

一九二七年，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大批屠杀共产党人。时局剧烈动荡。这时，有人投敌高升，有人无耻出卖，有人胆怯害怕，有人脱逃颓废……面对着这样的大动乱，佩弦在苦闷，在思索。他知道“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，才能解决这种惶惶然。”而他并没有那样做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，以及对妻子儿女的顾念，使他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去战斗，但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，也使他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他追求光明，他洁身自好。他象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，并用这种“自清”精神启发人们。在这种心情下，他写了《荷塘月色》。此时，他还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，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

一九二九年，佩弦的夫人武钟谦病逝了，他很悲痛，写了《悼亡妇》一文，来寄托哀思。

一九三一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，并企图一步步灭亡中国。在这国难当头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，佩弦又振作起来。他一步步地踏着一条无尽的然而实在的路前进着。

婚事 家庭生活

我家世代书香门第，原籍广东，但从高祖起就迁到四川了。我父亲排行第二，名叫陈正新。我母亲生了十二个孩子，仅靠父亲教些散馆及在估衣铺工作的收入来维持，生活是很清苦的。当时四川女孩子念书的很少，而我家比较开明，不仅男孩子能念书，女孩子也都读书识字。

我出生于一九〇三年五月，在兄妹中排行最小。我从小是三姐教识字，八岁进私塾，长大一些了，父亲就不让出去念书了。那时，我哥哥们常把买到的《小说月报》、《东方》杂志等带回家，我便也在读书中得到长进了。

我十六岁时母亲病逝，一百天后，父亲由于忧伤与贫困也去世了。父亲是个不苟言笑的人，他一生好义，肯帮助人，从不趋炎附势。这种洁身自好、清高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。

父母病逝后，我便考入了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开始了离开家庭独立学习的生活。在省一女师我学习了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也学习了《左传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及古诗词。学校浓厚的学习风气，严格的学习要求，打下了我坚实的学习基础。当时我受新思潮影响，认为女子要独立生活，不要依附男子。于是从一女师毕业后，我便与廖书筠等三个女同学离开成都到青岛去报考电话局女司机（女接线员）。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多，觉得还应该再学习，于是到北京考取了艺术学院，从此我开始了“工笔画”的学习生活。

在艺术学院，我曾受教于齐白石、肖子泉、寿石公等先生。

学习了哲学、美术史、古文、昆曲等课程,并接触了进步学生,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,还拜见了革命前辈李大钊先生。

经过四年的学习生活,我这样一个从小受封建教育,又在时代的洪流中接受新思潮洗礼的女学生,怀着对新生活的向往,从艺术学院毕业了。我先在第二救济院工作,强烈的正义感使我憎恨那校长克扣孤儿口粮的卑劣行为,因此,便辞去了这一工作。而后便一边教一个姓沈的太太学画,一边到我的老师浦熙元那儿学习昆曲。

我与佩弦的相识是在一九三一年。那时,因为我常到浦熙元老师那儿去参加“曲会”、老师看到我一天天长大了,北京也没亲人,便很关心我的婚事。他就与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导师叶公超谈起我,并请他帮忙。这一年

四月的一天,浦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,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。陪坐的还有两位清华大学教授。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。他身材不高,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,显得挺文雅正气,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“双梁鞋”,又显得有些土气。席间我们很少讲话。回到宿舍,我的同学廖书筠就笑着



朱自清与陈竹隐1931年结婚前

在北京中南海合影

说：“哎呀，穿一双‘双梁鞋’，土气得很，要我才不要呢！”当时我却并不以为然。我认为在那纷乱的旧社会，一个女子要想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严，建立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并不容易，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，华丽的服饰，更不追求金钱及生活的享受，我要找一个朴实、正派、可靠的人。为此我曾坚决拒绝了一个气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钱的人的追求。佩弦是个做学问的人，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，我很喜欢。他的诗歌与散文所表现的深沉细腻的感情，所描绘的一幅幅恬静、色彩柔和的画面，以及那甜美的语言，都使我很受感动，我很敬佩他。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，于是我们便交往了。

那时我正住在中南海，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。我们共同游览瀛台、居仁堂、怀仁堂；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潋的中南海边，有时清晨去钓鱼。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，还请佩弦喝了鱼汤。佩弦是个不苟言笑，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，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，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，征求我的意见。我逐渐体味到他写文章真是严谨认真呀！一次佩弦拿来一篇清华学生考试的词句古奥的文章让我读，我还真读好了句读呢。我心里很得意，佩弦也很高兴。我们的恋爱生活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，但都是倾心相待。佩弦话虽不多，却使我感到很诚恳，实实在在地关心我。

当我知道佩弦在扬州老家还有六个孩子的时候，心里也有过矛盾和斗争。我那时才二十四岁，一下子要成为六个孩子的妈妈，真不可想象！一时我很苦恼。要好的朋友劝我说：“佩弦是个正派人，文章又写得好，就是交个朋友也是有益的。”是的，我与他的感情也已经很深了。象他这样一个专心做学问又很有才华

的人，应该有人帮助他，与他在一起是会和睦和幸福的。而六个孩子又怎么办呢？想到六个失去母爱的孩子是多么不幸而又可怜！谁来照顾他们呢？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？于是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。一九三一年我便与佩弦订婚了。

一个月后，佩弦便到欧洲去游学了，他要去考察欧洲的文、学、戏剧、诗歌，以便更好地提倡新文学。在国外，他仍很关心国家的事情，尤其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终日忧心忡忡，在给定的信中一再写到自己焦虑的心情。他听到有人说中国没希望了就很愤慨。他认为中国只是政府不行，只要有好的政府，让有能力的人秉政，中国就会好起来。

一九三二年七月，佩弦由威尼斯回国，我到上海去接他。那时北京结婚还要坐花车，穿披纱礼服，礼节很多，而上海比较开明，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上海结婚。我们用当时上海最新式的简便方法举行了结婚典礼：事先发个结婚帖子。八月四日那天，请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，我记得有茅盾、叶圣陶、丰子凯等人，在一个广东饭馆聚会了一次。饭罢，我与佩弦便回到了旅馆。我们没有那罗曼蒂克的浪漫史，我们就是这样朴素而又真诚地相爱并结婚了。

佩弦是个非常勤奋的人。我们度蜜月时，他带着旅途回来的疲倦，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。为了他能安安静静地写，我们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。此后，我们共同生活的十七年的时间里，佩弦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。他的作息时间是安排得很严格的：早晨起床作早操，用冷水擦澡，洗脸，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，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。中午回家吃饭，饭后看报。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。吃罢晚饭，还要去图书馆，直到

闭馆才回家。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，一直到十一点休息。除了生病，我从未见他十一点前睡过。我常劝他中午休息一会儿，他也不听。他一辈子吃饭都是大口大口地很快地吃，深怕耽误时间。时间对他比什么都宝贵，正如他自己所写的“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但是，聪明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？”他真是抓紧匆匆来去的分分秒秒地读呀，写呀！连每天我们说话的时间都很少。刚结婚的时候我觉得有些苦恼，但渐渐看到他对事业的热爱，看到他不断发表作品，想到他对学生、对文学的贡献，常常为他的精神所感动，我想我应该支持他，我也要为他事业的成功付出代价，所以我便把家务事都承担起来，让佩弦更好地去研究学问。

婚后，我们回扬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。佩弦对扬州很有感情，那里的一山一水他都热爱，尤其留恋扬州的瘦西湖。他曾带我和孩子们一起去逛瘦西湖、平山堂。那天佩弦很高兴，津津有味地给我们介绍湖山及各处的风景，说得是那么生动，使人觉得真象是在诗画中一样。看到他那么高的兴致，我不禁笑着说：

“我看过一篇叫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的文章，把那儿写得那么美，其实不过是一湾臭水。真是文人哪，死人都说得活！”佩弦说：“喂！不要当面骂人呀！”我们都开心地笑了。佩弦对扬州的一切都感到亲切。连扬州的饭食都非常喜爱，尤喜扬州的晕菜“狮子头”。在扬州我还与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坟上去扫坟。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么深沉、那么炽烈。他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。

返回清华大学后，我们住在北院九号。那时清华大学规定教

授太太不能在清华工作，主要是禁止家属参预学校的事，我便想去城里教书。但是当时由于教育经费都被挪用了，各个校都发不出薪水。“女子文理学院”倒还发些钱，但我挣的钱连应酬都不够，无奈只好不工作了。

佩弦这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，工作很忙，一边担任教学工作，讲授三门课程，一边从事写作。为了探索新文学的道路，使新文学大众化，他还深入到下层老百姓中间，了解大众要求，学习民间语言。有一次他带我一起到劈柴胡同的茶社去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。那天我们听了刘宝全唱的《西厢记》，还买了《刘唐下乡》的唱片。佩弦还常常自己去听。他是想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些经验，研究新诗大众化问题。佩弦就是这样，千方百计地为提倡新文学而努力着。

婚后第二年，我们便把两个孩子从扬州接到北京来了。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便成为家庭中的一件大事。事先佩弦便与我商量好，对孩子的教育要双方取齐，就是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要当着孩子说，要事后再商量。这一条约束使我们避免了一些矛盾，并使家庭一直很和睦。

两个孩子都是在城里读书，住在学校，在生活上不搞特殊，在思想品德上鼓励他们进步。女儿本来在教会学校读书，因为参加反对成立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的游行，被学校不挂牌除名了。当校方把我和佩弦找去时，我们未责备孩子就将她转学了。记得抗战胜利回北平后，我们的一个孩子在中学念书。一个好朋友对我说：“这孩子在学校活动得很，思想太左，你要注意管管他，现在太危险啊！”佩弦知道后对我说：“左，左才是中国的出路，是青年人的出路！这样乌七八糟的政府，不叫孩子左，难道

还叫孩子右吗？”孩子做得对我们就支持，在家里我们一直是鼓励孩子前进的。

那时我们的生活很俭朴。佩弦的收入要寄一半给扬州，我们留用一半。所以每逢给孩子们交学费时，都要借一个月的薪水。佩弦待人很宽厚。每次让当差交信时，如里边有私人信件，都要给当差一些钱。他对人也很谦和，平时在路上遇到清华的工友他都打招呼。工友帮他作了什么事，他都很客气地说：“劳驾！谢谢！”他认为一个人有志持志，有力持力，用脑用体各有贡献，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。所以清华的老工友都说：“朱先生可好啦！”他在家与孩子相处也没有尊长的架子，有时让孩子倒杯水都说：“劳驾！”后来还是我讲：“让孩子们做事不要这样说，显得都没有父子感情了。”这样他才慢慢改了。

佩弦是个感情内向的人，平日话不多，但内心是很热的。他不仅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儿女，而且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，关心他的学生。一九三五年冬天，北京爆发了有名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十二月十六日，北京三万多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。头天夜里，佩弦对我说，他很担心学生又要流血。想起过去反动政府的种种暴行，他很为学生的安全忧虑。但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，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、正义的。第二天，他便同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。当听说许多学生在城里受伤时，他深感反动政府的残酷，很难过。

后来，佩弦还到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，途中，认识了后来成为党的负责干部的一位共产党员，回来便对我说：“看来，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员。他很有见解，中国要强起来，还要依

靠这样的青年，要这样，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。”佩弦从这位青年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。我们也正是怀着这种希望，度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战生活的。

共同的生活，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爱是广博的，他爱自己的事业，为此他一生精雕细刻，锲而不舍；他爱自己的故乡，无论走多远都怀念着它；他爱自己的亲人，是那样质朴、挚诚；他爱自己的学生，为他们的安危焦虑不安。他的感情象一池深深的潭水，沉静而深邃。

八 年 离 乱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。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，我们的生活也是颠沛流离、极不安定的，但这却使佩弦更加振奋了，他随着抗战的形势而忧喜，他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。

抗战初期，有个日本文化特务名叫“三室三良”的到清华作研究生。这个人时常请客，校长、院长、系主任、知名人士他都请过。每逢请客时，佩弦总是推说有事，一次也不去参加。一天，三室三良又请他，并说：“你哪天没事就哪天请，下礼拜没有事吧？”结果到了请客那天，佩弦找了一辆车，把全家人都拉到大觉寺去看玉兰花了。这样就得罪了这个日本人。后来一个人告诉我说：“竹隐，日本人可注意佩弦了。”北京沦陷后，梅贻琦校长先带一些职员南下长沙，不久来电报叫佩弦也去，于是佩弦马上南下了。走的那天，他戴着一副眼镜，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，加上他个子也不高，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，总算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。